



## 关于投资率和消费率高低之争

榆林

2008-9-17 10:58:14

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院

打印本页

关闭窗口

# 关于投资率和消费率高低之争

## ——改革开放三十年理论回顾与展望

**【内容提要】**本文分析了有关投资率和消费率争议的缘故和根源，指出并不是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投资率会就自动降下来。投资率高低，首先取决于市场需求，其次取决于垄断和行政控制的供给因素，如果资源价格扭曲，只会鼓励投资而挤占消费。总之，市场化要有竞争才具有效率，同时，市场化也是不断社会化的过程，市场化要以社会化为基础，同时，市场化要以社会化为条件，唯有如此，才能使得投资和消费比例逐步协调起来。

**【关键词】**投资率、消费率、增长方式

### 一、引言：高投资率是保证高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

投资率高低之争，三十年来一直存在。要描述这场旷日持久的争论及其政策影响，应首先了解改革开放起始阶段、即计划经济时的原有状态，然后再作比较。

关于投资率高低，计划经济时期就有过激烈的交锋。苏联三十年代，奥布拉任斯基提出社会主义原始积累，布哈林提出工农产品大流转，都旨在提高工业投资率，不但要有较快的投资增速，而且要在国民收入中占有较大比例。斯大林反对这些理论观点，不主张破坏价值规律，认为价值规律仍然要起基础性的作用。但是，他把价值规律当作手段而不是生产方式本身，仍然采取了加速工业化、加速积累的做法，在农业上则采取集体农庄这种所谓的社会主义形式不断提高工业积累、工业投资的比例，最后使得积累率在计划经济中占到绝对优势。

中国的计划经济，有过之而无不及。计划经济之下，一切积累归财政，一切投资靠财政，企业没有自主权，银行没有相对独立性，被形容为吃“大锅饭”，实则是僧多粥少的“大锅粥”。管理上靠意识形态之不断革命、靠不断变革生产关系来推动生产发展，十足的唯心主义。总路线和“三面红旗”无一不是想方设法人为提高积累率，加速工业化。通过强制命令方式统筹城乡关系、工农关系，实现工农产品的大流转和工业化积累所需要的资金，是以牺牲农业和农民利益为代价的。其结果，“多快好省”之中，工业投资增多了，发展速度加快了，唯有“好省”无一能达到，相反地，表现为国民经济失去了平衡和稳定的“大起大落”，最后总结出来的结论是：“最大的浪费是计划的浪费。”1980年以后，中央重新肯定了陈云过去提出的“综合平衡”思想，九五期间提出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十六大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又提出“又好又快”发展目标，将“好”置于

“快”之前，这些政策理念的延续和拓展，都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提高投资率、拔高增长率这种错误的片面的做法。

苏联的一系列做法，实质上是否定了斯大林自己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中加以肯定的东西，中国在1958年搞的“大跃进”，实质上是否定了毛泽东自己在1956年的《论十大关系》中总结出来的经验。那些在理论上曾被否定了的做法，在实践中却能够大行其道，最终以整体失衡和不稳定的结局爆发出来。为何在投资率问题上明知故犯、做不到理论和实践的一致性呢？这种现象决不是偶然的，有其必然性。

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计划经济条件下高投资都有其必然性，高投资率是保证高增长的最重要的手段。我们知道，经济增长取决于投资增长以及投资效率两方面因素。或者用较多的投资、或者有较高的投资效率，总之二者必居其一，才能得到较高的增长率。四、五十年代哈罗德、多马提出了有关增长的一般规律，六十年代初孙冶方、刘国光等探讨了中国的实际情况，内容涉及积累、消费比例关系、折旧率等。当然，后者目的是要纠正“大跃进”比例失调问题。这些结论，无论对于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都有指导意义。例如，同样的增长率，如果投资效率提高，那么，不需要那么高的投资增长率，相反地，如果投资效率递减，那么，就必须要有更多的投资才能保证同样的增长率。不幸的是，计划经济并没有达到前一种状态，而是陷入了后一种状态，即必须要用更多的投资来满足增长的需要，结果造成投资率居高不下。那么，为什么计划经济下投资效率会递减呢？

曾有一度时间，投资效率递减、投资回报率下降被看作是投资基数扩大之后产生的特有的暂时的现象，苏联官方就是持这种观点的，认为建设盘子大了之后要用更大量的投资来推动。或者说，设备更新资本扩张周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一定时期内投资回报率下降也是自然的现象。正因为用这样一些理由来解释，就没有再深究投资效率递减背后的原因，甚至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事实上，这些理由都是不充分的，甚至不是主要原因。投资规模扩大之后所产生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技术进步，足以抵消这些不利因素。根本原因在于官僚主义和计划经济本身对资源的错误配置和浪费使用，造成投资效率下降，其结果，相同的增长率，必须要用更多的投资。

这种体制之下，居民储蓄很少。为了最大限度地保证计划经济的实现，限制工资水平，当然物价也很低，此时农产品的购销价格也都很低，这样，消费水平也很低，真正做到了“低收入、低消费、低储蓄”。即便如此，也还是有一部分居民储蓄，但是，储蓄利率却被人为地压得很低。因此，这种体制最大限制地提高积累率和投资率。

这里，积累和投资是在几乎相同意义上使用的，其差别仅在于积累来源于新创造的利润的分配，没有包括折旧，而投资则包括折旧。此外，这里所讲的储蓄，不止是指企业存款、居民存款和政府存款，它的范围要广泛得多，是一个大储蓄的概念，是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讲的，指除了消费以外所有用之于积累的部分。从这个角度讲，计划经济下积累率很高，其比例占到GDP的60-70%，因而是“高积累、低消费”的发展模式。

这么高的积累率而资金使用成本却很低，无异于鼓励不计成本地浪费使用资金。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就是保证这种发展模式和增长方式实现的有效手段。因此，计划经济和国营企业天然地具有资本密集型、多投资不计资金使用成本、对资本的无限度吸纳的特征，科尔奈称之为患有“投资饥渴症”，即通过铺摊子，增大投资搞数量规模的扩张，而投资效率趋于下降。其结果，积累率越来越高，更多的资源被用于投资，挤占了消费，最终以短缺、以生活消费品匮乏方式表现出来，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严重扭曲。在资本稀缺的经济中，如果资本价格过低，本身就是制造投资和消费关系扭曲、造成资金使用浪费的极其重要的因素，造成资本更加短缺。

至此，过高的投资率被当作了计划经济的产物，成为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是保证计划经济实现的必要的条件。因此，总结计划经济的基本特征，可以用“三高”概括，即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挤占了消费，这个特点完全符合计划经济所谓的“先生产后生活、先投资后消费”的本质属性。

## 二、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然难以消除“三高”现象

三十年来实行市场化改革，其目的就是想改变“三高”特征、极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发展格

局。不但要改变体制，还要改变增长方式和发展模式。到了“九五”计划完成时期，中央正式提出“两个转变”，即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根本性转变。虽然这是针对扩大内需而提出的，但是，从根本上讲，这是对改革经验的总结和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预期。特别是企业这个层次，两种转变是合二为一的，作为市场竞争的主体，无论所有制结构、产业结构还是经营方式都必须转向与市场经济相适应，都必须提高投资效率。投资效率提高了，投资率自然也就降下来，当时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个阶段提出两个转变这一根本任务，可以说是很自然的，有了这个基础，往后再提出科学发展观，也就不难理解了。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科学发展观实质上就是上述改革观的延续和拓展。

的确，市场化改革一定程度改变了过去不合理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发展格局，提高了投资效率。市场经济必须要有竞争和效益，因此，在一些竞争领域就能够充分保证投资效率。然而，在其他非竞争的行政垄断行业，则不能保证有这种效率，因为资源配置和价格机制是扭曲的。尽管垄断行业和垄断集团保持高额的垄断利润，但是，从国民收入分配关系、从技术进步的源泉看，往往缺乏应有的效率。虽然有一些文献证明了一定时期的垄断能够提供技术创新的激励机制，但那仅是对研发和技术市场而言，对资源垄断、尤其是自然资源的垄断，必然是低效率的。由此我们得出这样的结论，只有充分竞争的市场经济才能保证资源的合理配置和良好的发展格局，不能简单地断言所有凡是实行市场经济的地方都能够保证资源配置效率的实现。资源垄断行业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外。正因为如此，尽管投资效率提高了，投资率还是降不下来，增长速度越来越快。

要想降低投资率，现阶段似乎还是做不到，也就是说“三高”特征还将长期伴随。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它是由一系列条件构成的。

首先是外向型经济。外向型经济最重要的措施是鼓励出口、给予外资和出口企业许多优惠政策。其结果，必然是资源消耗型的，由资源价格扭曲导致外向型经济消耗更多的劳动力、土地及其他资源。当然，出口换取外汇，用于进口资本密集型、技术密集型的机械设备。这种交换过程，本身就包含有巨大的技术进步利益，对于加速工业化是有导向作用的，但这丝毫不能掩盖对资源的过度使用。这是其一。

其二，外向型经济导致更高的投资率。我们知道，在国民收入平衡表中，投资和储蓄的差额除了靠净出口创造的外汇弥补之外，还利用外商直接投资等净资本流入。这种内外经济平衡是靠“双缺口”维持的，因此，必须保持汇率的相对均衡。汇率高估阻碍出口，外汇储备迟早会枯竭，汇率低估，鼓励资源产品出口，无异于补贴出口企业，导致外汇储备过多。在内外经济平衡中，汇率是配置资源的重要杠杆。当然，它并不是唯一的影响因素。随着资本市场的开放，外商直接或间接投资于股市和房地产的机会增多，预期资产价值和国内通货膨胀因素对于内外经济平衡的作用丝毫不亚于汇率，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这些净出口创造的外汇以及大量外资进入到股市和房地产领域，最终转化为更高的投资率。

而与此同时，开放市场使得农产品价格受到进口农产品挤压，处于较低水平，因而劳动力成本仍能长期维持较低的市场价格。只要农民还没有从农业生产的土地上转移到其他工业领域，国内劳动力供给是充分的，劳动力成本保持较低水平，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多使用劳动力资源。只要这条道路没被堵死，这种增长方式必然会复活。因为它不需要另外投入更多的资金用于研发和技术进步，就能够轻而易举地创造利润，那么，又何必转换成其他增长方式呢？所以，只要资源价格扭曲的条件还存在，那么，不管处于什么样的体制，不管是否采取了其他什么措施，必然会资源消耗型、规模扩张型的增长方式。

其次，是城市化过程。由于它是不彻底的双轨制，也导致投资率上升。农民工进城，并没有完全脱离农村，农民工的结构性失业风险不包括在工资里，表面上看劳动力成本仍然很低，实际上这些社会成本要由农民自己承担。征用农民土地，是按照农地产出的平均收益复合的，而土地改变经济用途时价值增值却很大，这部分收益大部分落入了开发商的腰包，这种利益导向刺激开发商囤积土地，导致土地上积压的资金越来越多。如果政府不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将难以遏制这股城市化、规模扩张型的征地势头以及数量扩张型的增长方式。

尽管投融资渠道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由于资源配置机制扭曲没有消除，也刺激了投资率上升。现行企业主要依靠自我积累、银行贷款、上市融资等几种主要融资渠道，而且越来越以自我积累和上市融资为主。由于两大融资渠道过低成本，即贷款利率过低，上市融资零成本，造成整个金融市场资金过度使用和浪费。所谓融资难，对大企业来说，则根本没有问题，而且是极低的资金使用成本，只是对小企业来说才构成发展的“瓶颈”，因为小企业要支付额外的信用成本。

所有制结构的巨大变化，也没有降低投资率。过去我们讲国营企业天然地具有资本密集型、高投资率倾向，但是，从市场发展起来的企业也同样具有劳动密集型、粗放型增长特征，市场壮大了劳动密集型产业，增加了就业机会，不仅提高了投资效率，也提高了投资率，这些特征都与外向型经济结合在一起的，资本积累速度比劳动就业、工资增长得还快。

总之，经济体制和增长方式的“两个转变”过程中，投资率不但没有下降，反而提高了外向型经济是利用农村剩余劳动力、扩大资源消耗实现的。城市化也是以消耗土地、占用农地为手段实现的规模扩张，这些市场经济因素极大地提高了投资效率，但是，要说投资率，则不然，不但没有降下来，反而提高了。这个阶段，粗放型和规模扩张型的增长方式仍然占主导地位，扩张投资仍然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手段，仍然具有的“投资过热”、“信贷过热”特征。

因此，有关投资率是高还是低问题，成了目前争论的焦点。

### 三、 投资率和消费率的高低之争

从微观来看，投资利润率高，因而有能力增加投资。（沃尔夫，2006；郝福满，2008）以此为标准衡量，正如一些人说的“投资不是太高了，而是太低了。”（宋国青，2006；北大课题组，2007）投资扩张本身也能够带来技术进步，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因为企业投资时，必然会考虑市场中潜在的竞争以及自身未来的生存状况，引进先进的技术设备，缩短投资周期，提高产出水平，增强竞争力。只要企业是自主行为而不是计划行为，放开投资的结果，必然会产生技术进步。这是不言而喻的。

由于过分依赖投资，一些最基本的市场制度，尤其是价格机制受到了垄断、计划和宏观调控的限制。在这种情形之下，投资利润率高，并不意味着仍然需要鼓励投资，而是相反，需要遏制投资。

（罗奇，2006；单伟建，2006）当然，遏制投资，是要遏制鼓励投资的那些扭曲市场供求关系的政策，如果这些优惠政策不受限制，光限制投资只会造成新一轮“寻租”现象。

例如，目前尽管投资回报率很高，但从总量供求关系来看，投资显然已经过热了，整个国民经济无法维持正常的投资与消费的基本平衡。尤其是土地投资，2010年以前的土地指标已经不够分配了。

经过了三十年的体制转轨，高投资率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严重。有人据此得出结论，认为“三高”现象与体制无关，只与发展阶段有关，它将伴随着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整个过程。体制可以强化或弱化这种特征，但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这种特征。尽管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的体制不同，实现方式和途径也不同，都具有相同的宏观特征。

投资率过高，第一，意味着存在过度的投资激励机制，使投资者驱之若鹜，有非常高的利益动机和积极性从事资本扩张，占有资源，其背后隐含着价格机制的不合理，意味着存在不均等的参与机会，同时意味着有较少的风险。说得更明白一些，就是行政性限制构成了这些投资者的保护伞。第二，意味着过度投机，造成未来的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通货膨胀最终损害的是储户和消费者的利益。第三，意味着融资格局不合理。不管是通过贷款、债券还是上市融资，过度投资意味着投资对消费的挤占。第四，投资过热造成的资产膨胀和通货膨胀，最终挤占消费。这些大的格局变化，有利于投资而不利于消费。这种不平衡，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是以短缺形式表现，而市场经济条件下则表现为通货膨胀形式。七五期间之所以会提出稳定压倒一切的口号，根源就在于投资过热、通货膨胀，最终导致经济和政治危机。

与投资率高低相对应的，是消费率高低问题。从全局和动态来看，投资与消费、投资与分配是分不开的。投资主要来源于利润分配，因而与消费联系在一起，同时，投资还来源于再分配，因而也间接地与消费联系在一起。投资挤占消费，不仅发生在初始分配领域，还有再分配领域，受价格、利率、汇率机制影响。

例如，我们知道，居民储蓄率（相对自身收入水平）是非常高的，相应地，消费率很低，国民没有提前消费或过度消费的习惯，可以把现期消费无限期地延迟到未来，因而时间贴现率很低。这本来是一种好事，有利于经济增长。但是，银行储蓄存款的利率是负数，因而产生了一个很低的资金时间价值，于是资金就被浪费使用了。那么，资金时间贴现率很低，居民储蓄是否就只能拿很低的利息，即资金的时间价值也应该很低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资金市场不仅取决于供，还取决于求，如果金融市场是开放的，竞争使得储蓄可以拿到到更高的回报，虽然这是再分配关系，但直接影响投资和储蓄的关系，也就是现期和未来期之间的经济平衡。（拉迪，2006）

有关目前的利息和地租，在极需要重新定义的两个市场。当然，三十年来有了很大改变，这是不可否认的事实。过去资金不讲利息，或只收取少量象征性的利息，既不体现资金的时间价值，也不反映资金供求关系；土地更不讲地租，地租被认为是剥削关系的体现。如此一来，造成资金和土地使用上的极大浪费。这种生产关系是不可能维持的，必然要改变。从再生产关系上看，过去的这种看法也是不能成立的。过去认为吃利息和收租金的人必然是消费型的寄生者，没有考虑到他们在再生产关系中会继续投资，作为人格化资本参与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促使这些生产要素更加集约地使用。这是我们欠考虑的地方，没有重视利息和地租应有的价值，这些基本生产要素的价格被人为压得很低，必然产生过度使用和浪费现象。这种状况至今改变。利益过度集中于投资者，储户和农民没有得到应有的报酬。

工资成本也需要重新定义。正当的社会化利益恰恰是最应该反映在工资里的。市场化就是一个不断社会化过程，应逐步建立和完善就业、医疗、教育、养老体系，不仅使得劳动者个体更加独立和自由流动，而且，要使得劳动者个体更加健全和有保障。市场化和社会化二者相辅相承，市场化要以社会化为基础，市场化并非意味着将农民逐出土地，工人失业之后可以不被安置，相反地，应该是劳动者有就业的机会，有失业的保障，这样才有利于劳动力市场的稳定和繁荣。因此，市场化要以社会化为条件。目前，职工工资中未包含社会化利益，而这些，工资水平尚未反映这些正当的利益诉求。虽然劳动力很便宜，但是，由于没有建立社会化的服务，缺乏应有的失业风险和就业保障，这些社会成本就由职工自己负担。对农民征地也只是针对农业产出的平均效益，丝毫没有考虑到社会化过程中农民未来发展的要求，相对于未来，实际是被边缘化了。从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看，就是投资挤占了消费。

从收入分配关系看，基尼系数差别更大了，实际上就是两极分化。虽然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即用于温饱需求的支出下降了，但是，城镇多数家庭收入中50%以上用于还贷，因而消费率比过去更低。最后的结果是，少数垄断企业攫取大部分的社会财富。

一个社会若只有少数巨富而大多数人贫穷，意味着中位数和众数的严重偏离。中位数和众数这两个数字是有社会学意义的，表明收入分配的分布状况和分布密度，众数意味着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中位数高于众数，但不至于差别很大。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收入水平或消费水平都是差不多的，一个人要靠才能、智力、机遇可能会改变收入和消费状况，但不至于改变得太多，起第一位作用仍然是资本和财富。即便如此，资本和财富也不可能改变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能够改变这种格局的唯有垄断，只有它才能改变一切，使得众数和中位数差别悬殊。严重的贫富分化，必然是与垄断联系在一起。而垄断将意味着大多数人通过自身的努力毫无发财的希望，这种市场结构将彻底破坏市场经济。一方面，垄断会进一步加剧贫富分化，另一方面，这种市场预期将从根本上摧毁创新动力。

#### 四、 结 语

三十年的实践表明，虽然体制已经改变，机制也已经变化，但是，投资率和消费率的基本格局并没有改变，反而走了一个U字型，致使众数和中位数更加偏离。

九十年代有一段时期出现了产能过剩、买方市场，才有了一些转机，不但降低了投资率，也使我们初步尝到了技术进步的甜头，大规模的转变开始形成了一些气候。但是，一旦转向扩大内需，鼓励投资，情形又改变了。因此，并不是转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投资率就自动降下来了，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是否改变投资率和转变增长方式，首先取决于市场需求，其次，还要考虑几方面的因素，

集中在价格机制上，包括利率、汇率和通货膨胀，这些都是垄断和行政控制的因素，说到底就是我们的市场经济还很不完善，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还没有起到基础性的作用。

要达到社会和谐，不止是协调人口、资源、环境等生产力关系，还要协调生产关系和分配关系。调整生产关系的目的是，是要使得市场主体包括劳动者在内都感觉有奔头，在大家都有奔头的条件下发展生产力，而不能笼统地、抽象地讲发展生产力，或者只有少数人有动力，大多数人缺乏应有的激励机制。这种情况下，谈不上提高大多数的幸福指数。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应该建立这样的目标，即能够动员广泛的社会力量，通过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靠自我奋斗，提高人力资本的价值，实现技术进步和效率。只有这样的努力才是无限的，单纯依靠物质投资总归是有限。堵塞了这条道路，将会造成无可挽回的社会损失。

今天所讲题目集中在投资率偏高、消费率偏低问题上，与“九五”时期提出的“两个转变”一样，都只是提出了问题，远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或者说，仅仅是解决问题的开始。

#### 【参考文献】

宋国青，中国投资率太低了，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6-11-10

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课题组，我国的资本回报率估测（1978-2006），讨论稿，2007-2

单伟建，中国企业的利润率之谜，www.feer.com，2006-9-6

罗奇，企业利润论战有三重意义，世行观点难以服人，www.vorganstanley.com，2006-10-6

郝福满，利润是动力，国企要分红——世行专家回应利润论战，远东经济评论，2008-1

沃尔夫，中国应要求国有企业“派息”，www.ftchinese.com，2006-10-10

拉迪，中国：走向消费驱动型经济增长模式，国际经济政策略览，2006-10-24

转载务经授权并请刊出本网站名

Copyright © 2005 www.  
All Rights Reserved

版权所有：马克思主义研究网 | 网站声明 | 联系我们

（浏览本网主页，建议将电脑显示屏的分辨率调为1024\*768）